

社区微更新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挖潜——以德国柏林社区菜园的实施为例

Research on Potential Use of Public Space in the Community Micro-Regener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Berlin Urban Gardening Implement

单瑞琦 SHAN Ruiqi

摘要 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的更新是近年德国柏林城市更新的关注重点,社区规划也以闲置公共空间的微更新方式为主。其实施机制灵活,既可借助政府主导的邻里管理规划,也可通过第三方引领实施;更新类型丰富,挖潜多元公共空间,进行场所再造;鼓励多元参与,进行新功能活化。柏林两个社区菜园的微更新案例说明,社区微更新能起到提升社区物质环境,同时加强场所活力的作用;但也在实践中出现了微更新场所被私有化、项目呈盈利倾向、不为社区居民所接受的现象。因此,社区微更新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社区微更新公共基金,形成完整的申请审批流程,制定符合当地条件的微更新场所使用规则,才能有助于政府实施监管,保障实施效果,实现公平正义。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 regeneration in Berlin pays attention to the upgrading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and facilities micro-regeneration of public space becomes a main way of community pla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regeneration is flexible, which can be led by the government plan,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The multi types of public spaces regeneration are realized by fi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public space for renewal, and by encouraging multi participation to activate the function. Two urban gardening cases in Berlin have shown that community regenera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promoting community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interaction. However, it also has privatization trend and profitability possibility. Thu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regeneration should establish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raising public funds and making rules to realize well supervision and social justice.

关键词 城市更新 | 社区微更新 | 社区菜园 | 柏林

Keywords Urban regeneration | Community micro-regeneration | Urban gardening | Berli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7) 05-0077-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单瑞琦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硕士

0 引言

上海市社区微更新实践从2015年开始实施,以已建成社区内低利用率的小型社区公共空间为主体更新对象的这类项目实践,引发了各界关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社区微更新实践,由于缺少更为成熟完善的实施机制和实施后的成效评估类研究,这类微更新可能会引发的问题还未凸显。本研究希望以已经有一定相似微更新经验的国外案例为例,分析其实施的成效优势与潜在问题,进一步为社区微更新

实践的机制建设提供经验借鉴,补充可能存在的不足。

1 从“城市更新”到“社区微更新”

1.1 城市更新概念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改善建成社区环境、促进邻里和睦为目的,并融入公众参与规划思想的社区规划,越来越多地对城市更新的观念和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方学界展开了关于城市更新概念更为广泛的讨论。无论

是英国政府给出的城市更新定义,还是Peter Roberts作为西方城市更新研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所提出的概念,城市更新的内涵都更加丰富,更具有综合性。城市更新不再局限于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城市更新地区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受益,最终达到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衰败城区的经济提升的目标^[1-2]。

1.2 城市更新发展阶段

城市更新的发展动力、实施机制、更新对象、更新结果、表现特征等各方面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20世纪70年代前的拆除式城市更新,以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方式对贫民窟进行大规模清除;进入70年代后,转变为以已建成社区的历史住房为主体对象的谨慎的城市更新,依赖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关注已建成社区的综合提升,促进周边的经济复兴;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多方伙伴关系在更新实践中的推行,社区的公众参与和社区能力的培养,社区内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的更新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新取向^[3-6]。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变化,物质环境的更新与社会网络的更新都进入了更缓慢、谨慎的阶段,以小型的社区公共空间为主体改造对象的局部微更新方式,成为了带动提高社区活力,提升社区空间品质的新方式^[7]。

1.3 社区微更新特点

微更新之微,具有尺度微、投入微的特点。(1)更新对象微:是社区闲置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和功能塑造,社区入口、小广场、小公园等微小地点的更新;(2)实践投入微:基本投入小,使得实践本身具有更低的准入门槛,同时能够实现多样的合作形式;(3)导向切入点微:往往是从问题出发,提供临时策略,解决微小需求,实现微小的功能完善。但也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是综合导向型的更新,是包括创意、建造、制作、服务、管理和运营在内的一系列策略的整合^[8-10]。

社区微更新的实践在国内已经起步,在上海市陆家嘴缤纷社区的三航小区、上海市五角

场地区的创智农园等实践,都是结合了社区有机更新,挖掘利用小微空间,采用渐进式环境改善模式的社区规划尝试,通过针灸式微更新来整治和丰富空间使用,提升空间品质^[11-13]。

这些尝试与研究说明现在社区微更新已经成为了上海社区规划的主要方式之一,为探寻社区微更新完善的实施机制建设经验,本文将以德柏林的社区微更新实践为对象进行研究,从而对我国刚起步的社区微更新实践提供有效借鉴。

2 德国柏林从“谨慎的城市更新”到“社区微更新”

2.1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

在东、西德未统一前,20世纪80年代的柏林IBA是最著名的西方城市更新的实践项目,通过“谨慎的城市更新”方式,在战后大量补缺被炸毁的老建筑以形成完整的街道界面,从居民更新需求出发修补不能再使用的既有建筑,提升居住品质,既尊重了原住民的意愿,也维系了社区的生存。但这种在物质更新的同时能够保障社区社会属性的延续的更新,是当时依赖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实现的^[14]。而在两德统一之后,财政支出具有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城市更新层面的预算有限,缩减后的资金无法再延续政府主导下的谨慎的城市更新,于是公、私、社区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逐渐加强^[14]。社区和邻里,特别是社区更新能力的培养和各类社区更新项目的推进,创意人士、志愿者特别是社区人士或地方组织、社区合作伙伴、乃至第三方在城市更新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15]。

2.2 从建筑尺度的嵌入式更新到公共空间的微更新

随着政府在社区更新中的主导作用的减弱,更新的参与者逐渐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因此更新项目类型也随之转变。街区层面建筑尺度嵌入式更新的项目越来越少,成本投入较低、又能造福社区本身的项目越来越受到关注。从1999年推出“社会城市规划”(Sozial Stadt),

以社区为单位,选定“邻里管理区”^①,从社区层面尝试推进具有提升社区凝聚力的微更新项目。德国联邦政府给“邻里管理区”的“社会城市规划”项目的公共资金占联邦政府投入的城市建设类公共资金投入的9.7%(其他支出包括城市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城市开发发展专项资金、城市更新项目专项资金等)^②。此外,各州政府与区政府都会再针对各“邻里管理区”的不同情况给予各不同的微更新项目以资金上的支持和管理上的帮助。

3 柏林社区微更新的两类实施机制

柏林社区微更新的两类实施机制包括:(1)“邻里管理”规划,即以政府为主导选择其认为应该主动帮助提升的社区,为这些社区制定微更新规划,并提供资金、管理等综合性的帮助;(2)自下而上,由不同的志愿者、第三方或其他创意人士牵头,自发组织社区微更新规划,通过私人投资得以实现,实施成功后可申请获得正式的土地临时使用权。

3.1 政府主导的社区微更新——柏林的“邻里管理”计划

“邻里管理”规划是德国“社会城市规划”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帮助问题社区建立积极的街区形象,一般会选择将衰败落后、缺乏活力的社区确定为“邻里管理区”。一旦划入“邻里管理区”,则将由该社区所在区政府主导推进进行社区微更新。在柏林,“邻里管理区”往往都是外来移民多、邻里沟通少、公共空间不足、失业率高、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低、平均收入低的社区^[16]。

通过划定特定的“邻里管理区”进行社区微更新的项目推进,依赖各自的邻里管理办公室进行管理,组织居民提出意愿,组织设计方案,最后申请政府资助实现,来提升街区环境和生活品质。这类社区微更新项目有专门的政府资金支持和系统的规划引导,它可以通过完善的流程实现社区更新项目的资金申请和项目实施。邻里管理办公室更多承担组织者的身份,组织引导社区进行微更新规划的制定,再

注释 ① Quartiers management译做邻里管理,译法参见,薄力之,邓琳爽.边缘社区的公众参与——以柏林邻里管理项目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3(2):88-93。

② BBSR. Die Stadtebauförderungsdatenbank des BBSR, 2009. 由城市发展数据库中1991至2008年的城市建设公共资金投入情况总结, p6。



图1 邻里管理下的社区更新实施流程图
资料来源：<http://stadtentwicklung.berlin.de>。



图2 第三方主导下的社区更新实施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将方案规划交给由专家、居民等各方人士所构成的社区更新行动基金陪审团，来共同决定该项目是否获得审批通过，能否实施。对社区内的闲置资源的活化改善方案提供不等的资金支持（图1）。

3.2 自发组织的社区微更新——柏林的“创意文化”氛围

而第三方组织或一些居民自治组织的微更新项目，主要是依赖前期第三方的主导，接着进行项目的策划宣传，吸引社会投资在社区成功投资实施后，最后通过政府的合法化审批途径来实现土地使用用途的合法化，并申请获得一定的社区更新类公共资金支持（图2）。这类社区更新项目的成功，往往需要具有创意的项目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的组织者引领。

在柏林的Kreuzberg区，Moritplatz社区边有一个6 000 m²的闲置地，从2009年6月开始，Prinzessinnen菜园从曾经做过工业用地，后闲置在街角的公共空间转变为社区菜园，成为了德国社区更新的创意先驱。Prinzessinnen菜园在柏林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所在社区从默默无闻的普通社区变为名声大噪的景点。Prinzessinnen菜园作为柏林社区微更新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创意人士在社区更新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由于受到了柏林市民的广泛支持，这个起先并不符合土地使用规定的项目，获得了土地的暂时使用权和经营许可权，完成了这类自发组织的社区更新项目从创意到实施再到合法审批通过的过程。

4 柏林社区微更新的多元功能类型

在欧洲的后工业时代，有大量所谓的“等待中的空地”，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功能，进而提供了实现创意空间的舞台，即可通过挖潜的方式使闲置公共空间或建筑资源被创造性地再利用^[17]，推进渐进式的社区微更新实践。

4.1 缘起：柏林社区微更新的更新对象——闲置公共空间或社区内闲置的资源

在1996年的时候，柏林政府发现一些街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问题，尤其有些街区有明显的社会隔离状态。而这些街区的共同特点是对街区的公共空间部分非常忽视，几乎没有能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社区环境品质低下。所以导致对居住环境有所要求，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和优势群体会搬离此地。这种搬迁趋势就会导致这里的社区走向更加衰败的境地，街区租金下降，越来越多地集聚弱势群体（吸毒、酗酒、无家可归者），新老居民之间的矛盾等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而柏林政府认为，这样的地区衰败特征，可以通过小规模社区微更新的方式改变其现状。核心就在于努力挖掘闲置公共空间或建筑物的潜力，通过挖潜再利用的方式活化社区。

4.2 柏林社区更新的更新方式：多元的公共空间活化方式

在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柏林3 000多个“邻里管理”项目充分体现了柏林社区微更新类型的多样性^[18]。目前比较显著的社区微

更新成果有：在社区闲置公共空间或建筑中设立“家长学校”、“老年电脑培训”、“彩虹德语教育”、“推广游泳课”、“与画廊合办活动”、“建立土耳其阿拉伯文化中心”、“开放式咖啡”、“青年创意工坊”、“爱植物”、“我的街区画展”、“联盟球场”与“文化混血杂货店”等多种多样的项目类型（图3）^[18]。从外部环境内新增的绿化种植、社区居民志愿贡献的街头座椅，到由临时搭建的游乐设施转变为固定的社区中心等，都在增加着邻里的凝聚力，改善着街区的外部环境，提升着居民参与就业培训、休闲文化活动的机会。

4.3 柏林社区更新的明星模式：公共空间转为社区菜园

鼓励居民使用闲置公共空间或建筑的更新导向促进了柏林社区微更新功能类型的多元化，而这其中社区菜园是最受欢迎的社区闲置公共空间再利用的功能之一^[19]。社区菜园在柏林具有非常突出的趋势，其典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其一，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挖潜现象，可以提升社区的空间活力，能促进创意活动的产生，激活相对弱势或本身社区环境相对较老旧的地区，改善缺乏公共空间的社区现状，吸引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参与，将二次世界大战给这座城市留下的一些街角空间的衰败痕迹转化为生机勃勃的菜园。

其二，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运动或城市社会心理的变化，体现了消费批判的文化态度，也



图3 柏林社区更新项目实施照片
资料来源: Das Berliner Quartiersmanagement.



图4 柏林社区菜园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 <http://map.google.com>.

就是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成长、健康这样的生活态度具有极强的认同感,社区菜园体现了一种参与、绿色、生态的理念。

其三,它是一种都市与农业的碰撞,是追求创意的现代人士实现城乡生活结合的重要标志,社区菜园还能起到改善棕地的生态环境、加强青少年对农业植被的认知、解决城市乡村的认知环境割裂等问题的作用。

因此,迄今为止,在德国几百处社区菜园产生,柏林的社区菜园也分布甚广,已形成至少26处(图4)^③,可谓柏林社区更新的明星模式。社区菜园成为了城市共享和公共文化生活的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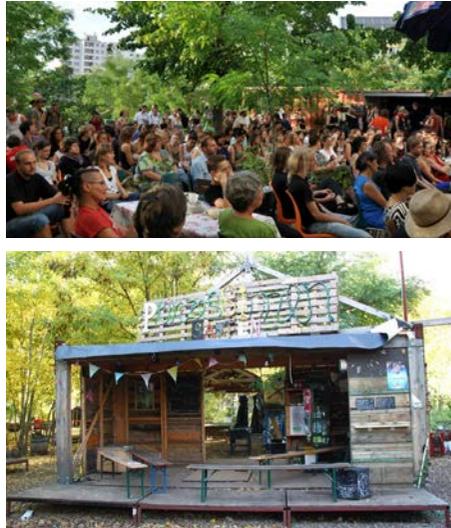


图5 柏林Prinzessinnengärten菜园现状照片
资料来源: 作者自摄、菜园创始人提供。

表性功能,原为社区闲置的公共空间通过使用用途的转变,被作为临时的实验场地,为社区活动、邻里交往提供了空间。

5 柏林社区微更新实施分析——以两个社区菜园为例

从柏林的实践中可见,显性的公共绿地是最容易成为社区微更新对象的公共空间,而闲置公共绿地转变为社区菜园是最受欢迎的功能活化方式之一。社区内不可参与的公共绿地和街头废弃的公共空间转变为了社区多年龄层居民可以共享的社区菜园、儿童的自然教育基地、新的邻里交流场所。

由于城市更新的方向进入社区、邻里级别,对更新效果的研究也增加了从经济学视角评价更新对地方经济的复兴效果^[20],从社会学角度评价规划项目是否“改善了环境、促进了邻里和睦”^[21],从居民反馈的角度评价更新给规划地区带来的变化,社区更新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业主、租户、居民和社区商业的管理者、从业者的愿望是否能得到实现^[19]。基于以上的研究,作者将分别对两个社区菜园的组织者、管理者、菜园使用成员、外来访客及周边居民进行访谈,通过实际案例反思柏林的社区微更新实施成效。

5.1 社区菜园实践概述

Prinzessinnengärten是自下而上实现的社区更新项目,从一片街角空地转变为了郁郁葱葱的社区菜园,受到了柏林诸多市民的广泛关注,其采取的移动菜园即通过框篮、纸箱、牛奶盒等进行可移动种植的方式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其中。而定期开办的讲座、各类识别食物与植物的组织活动都带动提升了该项目的知名度。菜园内的咖啡吧为维系菜园的经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图5)。随着项目知名度的提升,该项目从自发组织到经营权获得审批通过,获得了20年的土地使用许可。每年30个长期工作人员,700个志愿者,50 000名参观群众的数据表明,该社区菜园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作为社区新增的公共空间的意义。它成为了柏林的新地标,为汉堡等城市社区微更新提供了标杆样板,是德国自下而上的社区微更新项目的典范。

Interkultureller菜园是柏林政府主导的社会城市规划里“邻里管理”项目中的一个,其位于Interkultureller社区的中心绿地位置(图6)。社区居住人群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该公共住宅社区的中心绿地长期处于荒废状态,杂草丛生。柏林政府认为需要对这块闲置社区公共绿地进行活化利用,于是,通过邻里管理办公室组织引导,进行了社区微更新方案策划,将这里改造成为了一个拥有划分整齐的菜园、养蜂区和社区咖啡馆的富有活力的场所。

与幼儿园和大学以不同的合作形式推进开展不同的项目,成为研究和非正式的学习地;与慈善机构合作举办慈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都使得这两个社区菜园成为了柏林的新地标。

5.2 社区菜园实施成效与问题

社区菜园对社区物质环境的提升作用得到普遍共识,社区菜园这样的微更新项目可以起到美化社区环境的作用。从组织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角度看,社区菜园也可以起到促进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流的作用,营造出具有社交功能的社区空间。

除上述优点外,被访居民普遍认为社区微更新对邻里促进融合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社

注释 ③ Bendt P, Barthel S, Colding J. Civic greening and environmental learning in public-access community gardens in Berli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109(1):18-30.

区居民并不是社区闲置公共空间挖潜后形成的社区菜园的真正使用者。社区菜园成为了一种时尚的休闲活动,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其中,自下而上的Prinzessinnen菜园受到的质疑更大。由于菜园可以通过售卖蔬菜种子和种植材料、运营咖啡厅,和各类项目合作,使得该场所有成为个人盈利场所的可能。作为精英阶层的方案策划者、建筑师,甚至是那些以居民身份出现的其他行业的城市精英,可能会通过社区微更新实现个人利益或个人追求。

5.3 社区菜园实践反思

表面上这种转变使得社区的闲置公共空间的使用,从专业人士的手里转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基层群众的手中。但是柏林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更新依然由社会的精英群体的决断为主导,不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居民的选择。

空间的有限性,使得可以在这个菜园使用的群体是有限的,这依然是一个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相对年轻的和中产阶级群体所使用的地方,而并不能属于周边居民。怎样鼓励所有居民都参与到这样的微更新实践之中,使大家都能受益,作为一个活跃的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产品,如何避免社区微更新后的空间被私有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6 对我国社区规划发展的启示

6.1 挖潜公共空间,进行场所再造

社区规划可采取低成本、低门槛、广参与、多合作、易应用、实践导向、精英导向、行动导向、综合导向、问题导向下的城市微更新方式,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小规模功能置换,活化社区。主要更新对象是可控的闲置公共空间或建筑,包括了无人问津的绿地,暂时未被使用的闲置地,可开放和提升的废弃建筑等资源。

6.2 鼓励多元参与,进行新功能活化

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需要创意项目的策划,鼓励多方参与。柏林一直致力于推动社区微更新项目,对创意的包容和城市对个性表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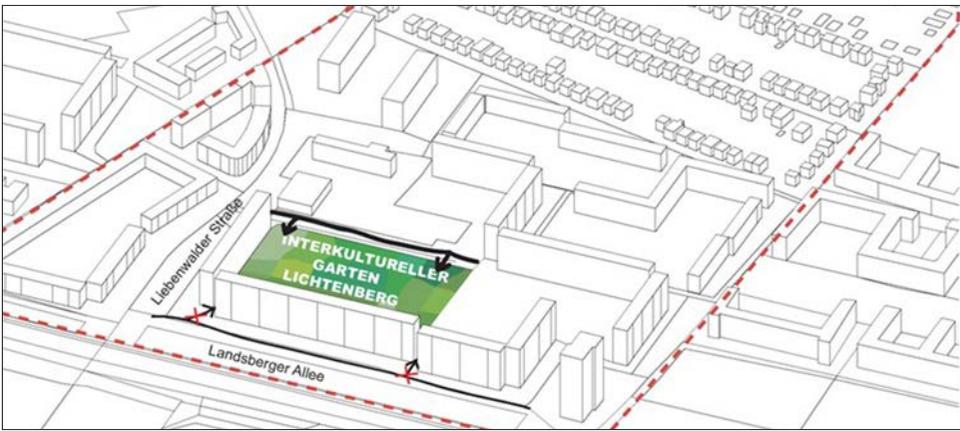


图6 柏林Interkultureller菜园的位置示意与现状照片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自摄与菜园管理者提供。

鼓励是提升柏林作为具有多元魅力城市吸引创意人士的重要手段。与社区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小学、周边的大学等机构联合举办活动,将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文化认同的创建可以使这些更新后的场所成为社区地标。

2015年,上海进行了一定的社区规划实践,并通过举办“城市空间艺术季”,由市规土部门主导,结合社会组织、居民和规划师、建筑师、艺术策划对社区环境要素进行微更新。其中,在鞍山四村老旧小区建设的“百草园”项目就是上海的都市农园实践,该项目设立了芳香花园、儿童游乐场地、竹林探秘、野花草坪、一

米菜园、艺术廊架等主题活动区。居民以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志愿活动,为社区提供了交流共享的空间。应继续鼓励这类创新实践。

6.3 建立管理机制,加强后续监管

以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为社区菜园的案例来看,这种功能活化形式是具有普遍需求的。国内很多社区里都出现了居民擅自将公共绿地改变为自家的菜园的现象,但物权法规定每个居住小区范围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要改变其形态、用途,应由业主共同决定,个人无权擅自分配使用。因此这种转变,应该由社区共同完成。

同时居住小区内的用地性质是住宅用地,而不是农业用地,把绿地改成菜地,其实存在擅自改变了土地性质的问题。因此非法的土地用途的改变,和私人的利益诉求,不能借助社区更新项目的推进而被合理化了,前期的审批机制与后续的监督与管理都非常重要。

7 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社区微更新的实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地方社区居民与组织在社区更新过程中如何发挥真正的作用;如何避免社区微更新成为设计师、建筑师或策划者表演的舞台;如何避免微更新后的公共空间成为与社区居民无关的新的利益场所,避免社区微更新项目的创始人将这个公共用地化作商业用途;如何避免成为吸引游客和人群参观的面子工程;如何通过社区生活实践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协作共享来重新确定空间的公共性意识,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微更新可能存在的隐患给予足够的注意,才能使得社区真正受益。结合柏林案例的经验来看,政府应建立专门的社区微更新基金,形成社区更新项目完整的申请审批流程;同时要能为社区微更新场所制定出符合当地条件的使用规则:如给出社区微更新场所界定清晰的边界,规定社区微更新场所可以使用的时间等使用规则,计算微更新场所的运营成本与收益等,才能有助于政府实施监管,保障实施效果,实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ROBERTS P. The 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purpose of urban regenera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9-36.
- [2] MCCONNACHIE M, MCGREGOR A. Social exclusion, urban regeneration and economic reintegration[J]. Urban Studies, 1995,32(10):1587-1600.
- [3] 谭英. 北欧旧城居住区的更新与改造[J]. 世界建筑, 1996 (2) :22-29.
- [4] 陈则明. 城市更新理念的演变和我国城市更新的需求[J]. 城市问题, 2000 (1) :11-13.
- [5] 翟城庆, 伍美琴. 城市更新理念与中国城市现实[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2) :75-82.
- [6] 方可. 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 (1) :59-61.
- [7] 单瑞琦, REICHE M, AGOSTINI G. 上海叙事: 将城市针灸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遗产保护和发展策略[J]. 上海城市规划, 2013 (6) :77-80.
- [8] 杜鹏. 社区环境微更新中的自治治理[J]. 时代建筑, 2016 (4) :62-67.
- [9] 龚书章. 以再生与公共意识启动城市的微更新行动[J]. 时代建筑, 2016 (4) :29-33.
- [10] 蔡永洁, 史清俊. 以日常需求为导向的城市微更新一次毕业设计中的上海老城区探索[J]. 时代建筑, 2016 (4) :18-23.
- [11] 杨贵庆, 房佳琳, 关中美. 大城市建成区小尺度公共空间场所营造与社会资本再生产[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1-7.
- [12] 刘悦来, 尹科变, 魏闰, 等. 高密度城市社区花园实施机制探索——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29-33.
- [13] TAN Ying. Renew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sidential areas of the northern European old city[J]. World Architecture, 1996(2):22-29.
- [14] CHEN Zem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enewal concept and the demand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J]. Urban Problems, 2000(01):11-13.
- [15] ZHAI Binqing, Mee Kam Ng. Urban regeneration and its realities in urba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9(2):75-82.
- [16] FANG Ke. Developing processes of western urban renewal and its enlightenment[J].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8(1):59-61.
- [17] SHAN Ruiqi, REICHE M, AGOSTINI G. Narrative Shanghai: taking urban acupuncture as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community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3(6):77-80.
- [18] DU Peng. Self-governance of micro-regeneration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J]. Time+Architecture, 2016(4):62-67.
- [19] GONG Shuzhang. Social network booting, urban micro-regeneration acting[J]. Time+Architecture, 2016(4):29-33.
- [20] CAI Yongjie, SHI Qingjun. Daily-needs-oriented urban micro-regeneration explore the old city of Shanghai in a graduation project[J]. Time+Architecture, 2016(4):18-23.
- [21] YANG Guiqing, FANG Jialin, GUAN Zhongmei. Place making of small-scale public space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built-up areas in big citi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 1-7.
- [22] LIU Yuelai, YIN Keluan, WEI Min, et al. New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garden practices in high-density highrise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KIC garden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29-33.
- [23] 奚文沁. 社会创新治理视角下的上海中心城区规划发展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8-16.
- [14] XI Wenqin. Research o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the view of soci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 8-16.
- [15] CARLEY M. Urban partnerships, governance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Britain's cities[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0,3(5):273-297.
- [16] ROSOL M.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st-fordisturban green space governance: the case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Berl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0,3(34):548-563.
- [17] MARTIN G. Leistungsfähigkeit des städtebaulichen Instruments Milieuschutzfür die Stadtentwicklung in Berlin[D]. Berlin: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2008.
- [18] PACETTI M. The sustainable city VII: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ustainable. WIT Press,2012.
- [19] Quartiersmanagement. Das Berliner Quartiers management[R]. Berlin: 2010.
- [20] 殷成志. 德国城市建设中的公众参与[J]. 城市问题, 2005 (4) :90-94.
- [21] YING Chengzhi.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erman urban development [J]. Urban Problems, 2005(4):90-94.
- [22] 严若谷, 周素红, 闫小培. 西方城市更新研究的知识图谱演化[J]. 人文地理, 2011 (6) :83-88.
- [23] YAN Ruogu, ZHOU Suhong, YAN Xiaopei.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map of western urban regeneration study[J]. Human Geography, 2011(6):83-88.
- [24] 阳建强. 西欧城市更新[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25] YANG Jianqiang.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Europe[M]. Nan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6] 姚佳纯. 马斯洛需求理论下的现代社区规划设计思考[J]. 规划师, 2015 (1) :140-144.
- [27] YAO Jiachun. Modern community planning issues based on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J]. Planners, 2015(1): 140-144.
- [28] 黄耀福, 郎胤, 陈婷婷, 等. 共同缔造工作坊: 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新模式[J]. 规划师, 2015 (10) :38-42.
- [29] HUANG Yaofu, LANG Wei, CHEN Tingting, et al. Collaborative workshop: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J]. Planners, 2015(10): 38-42.